

【读史所得】

“强项令”董宣的祠堂——“孝堂山石祠”释读

□汪灏 海博

孝堂山石祠位于山东济南长清区,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原地面房屋建筑。石祠以雕刻精湛、内容丰富、保存信息完整的汉画像享誉海内外,具有重要的历史、艺术和科学价值。孝堂山祠主是谁,一直众说纷纭。笔者通过对石祠内有关画像的研究,认为祠主当是东汉初期著名的酷吏——“强项令”董宣。

观察祠堂内部,画像石依建筑结构分成三大主体部分:后壁和东、西两壁。一般认为,祠堂后壁的“楼阁拜谒图”表现的是“祠主”。与常见祠堂中只有一座“楼阁拜谒图”不同,此处有三座楼阁、三位受祭人。最下层一列车马出行图,中间偏左有一乘輶车,后坐一位官员,题记“二千石”。从舆服和人物所处的位置上判断,画像所反映的,正是享受“二千石”官俸的祠主本人。

“楼阁拜谒图”的上列有更大的车马队伍,左侧有一乘豪华的驷马羽盖安车,车前有“鸾雀立衡”,题记“大王车”,前人解读为“大王出行图”,反映的应该是祠主生前事奉的诸侯国王侯。北壁这幅图画其实只是一个长卷画像的中间部分,它的头和尾一直延伸到东、西两壁,贯穿整个祠堂。出行队伍之庞大、场面之恢宏,在汉画像石中绝无仅有。大王车马从西向东行进,东壁的右侧,迎接大王车马的官员有上、下两人,分别题记“相”和“令”。

汉画像内容一般是以比较固定的格式化套用,祠堂内乍看人物众多,眼花缭乱,详加分析归类,其实并不复杂。如伏羲女娲、王母风伯、孔子周公、庖厨宴饮、狩猎游戏、胡汉战争等等,在汉画像石中司空见惯。显然,只有特殊的画面,才可能透露祠主信息。孝堂山石祠东壁第五区,不见于其他汉画像石,引起笔者的注意。

第五区画像也似一幅“车马出行图”。画面共有23人,从左到右,可分为两个部分。笔者发现,这幅画像所反映的内容,与东汉“强项令”董宣捉拿公主家奴的故事相似。

董宣主要活动在东汉初年,是著名的“铁面酷吏”,先后出任过北海相、怀令、江夏太守和洛阳令,所到之处,打击豪强、维护一方平安,对东汉初年治乱有突出的表现。

《后汉书·酷吏列传》记载:“后特征(董宣)为洛阳令。时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,因匿主家,吏不能得。及主出行,而以奴骊乘,宣于夏门亭候之,乃驻车叩马,以刀画地,大言数主之失,叱奴下车,因格杀之。”大意是说,董宣被委任为洛阳令后不久,就遇上一件棘手的案子。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的家奴“苍头”,光天化日之下杀人,然后藏匿在公主家。一天公主出行,把这个杀人的家奴也带上了,董宣就在出行的队伍必须经过的夏门亭等候。等马车到了,董宣“驻车叩马”“以刀画地”,大声宣布公主的过错,叱斥苍头下车,“因格杀之”。

再看画像故事:董宣打听到公主的车队要出城游猎,杀人的苍头就在其中,于是亲率四名弓弩手、两名健壮的狱吏和两名随从的府吏,在公主车队必须经过的路上,布下天罗地网,等候抓捕凶手。这时,他的老部下水丘岑知道了,很为他的举动担心,马上赶过来,试图阻止他的行动。董宣不听,说话间,对面车队来了。一名狱吏(也可能是“苦主”)认准了苍头就坐在仪仗队最前面的辇车中,扑上去抓住了车轮,另一名狱吏迅速抓住马缰绳,逼停了辇车,举刀呵斥苍头下车;苍头急向队伍后边的公主呼喊求救,四名弓弩手早已在车后阻断了行进的队伍,事发突然,家奴都不敢妄动;这时,走在前边的家奴发现对面洛阳令的輶车,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,跪求董宣放过;董宣毫不理睬,手中轻摇织竹圆扇,扭头观看抓捕行动……

史书记载与画像有三点出入:一是记载公主出行以苍头“骊乘”,似说乘坐同一辆车上,画像上则是苍头独乘一辇车;二是记载董宣“驻车叩马”“以刀画地”,画像上的董宣却在远处观望,并没有亲自动手,这似乎更加合理;三是画像中出现了一位身佩印绶、牵住董宣车马的高级官员,史无记载,可能是董宣从前的书佐、当时的司隶校尉水丘岑。

之后即发生了“强项令”的故事:公主气恼,回宫向皇帝哭诉,说受了董宣的欺负。皇帝大怒,召董宣问罪,欲鞭杀之。董宣道:“皇上圣德中兴,而放纵家奴杀害无辜,将何以治理天下?臣不劳你鞭杀,请得自杀”,即以头撞向大殿楹柱,血流满面。皇帝令小黄门赶紧抓住他,让董宣给公主叩头赔罪了事,董宣不从,

强使顿之,董宣终不肯俯下脖子。皇帝笑道“让‘强项令’下去吧”,事后又赐钱三十万,董宣把钱全数分给了手下诸吏。此后搏击豪强,无不震栗,京师号称“卧虎”。

据《董宣传》记载,董宣在任洛阳令之前十多年间,至少还有三次在地方为官的经历。董宣是受到司徒侯霸的举荐,从幕僚小吏做起,逐步升迁至北海相——这就是在画像上题记“相”的官员。

按《郡国志》之“北海国”条,“建武十三年有菑川、高密、胶东三国,以其县属”。董宣当在建武十三年以后方到北海相任上。董宣到任后,先任用当地的豪强大族公孙丹为五官掾(相府的属吏)。公孙丹父子因杀害无辜路人,董宣处死了公孙父子。公孙宗族亲党三十多人操兵叫冤,围攻相署,董宣以公孙丹以前依附王莽,不是善类,又考虑到他的党羽众多,担心他们再次勾结海贼造反,于是痛下杀手,指使门下书佐水丘岑将他们全数捉拿杀死。青州刺史闻知,以其滥杀奏请治董宣的罪。

在青州大狱,董宣表现得毫无惧色,甚至大义凛然。就在行刑的关头,光武帝派使者持赦书到了。使者重新审讯了董宣,并如实向光武帝汇报了案情原委,于是有诏命:董宣降职使用,转任河内郡怀县令,以观后效;令青州刺史部不要再追究水丘岑的罪,另有任命——水丘岑后来做到司隶校尉(二千石),可能就是画像上试图阻止董宣的那位“佩绶牵马人”。

不久江夏郡有剧贼寇乱,光武帝想起了董宣,任命董宣为江夏太守——这就是出行图上题记“二千石”的官员。

董宣一入郡界,即发布公告:“朝廷以董某为太守,因能擒杀奸贼。今勒兵界首,诸位看到公告,要好好考虑自己的前途!”贼众闻董宣的名字已惊恐,自动归降、解散。董太守一身正气,最看不惯豪强权贵仗势作威,很快与郡都尉、外戚阴氏闹翻。董宣再次免官,在家赋闲,直到任命为洛阳令——就是在画像中题记“令”的官员。

董宣官运多舛,六十岁始升任北海相,国相和江夏太守都是二千石的高官。最后任洛阳令,虽说是京官,其实和怀县令一样,都是六百石官俸的县令,属于降级使用。董宣在洛阳县令任上干了五年,74岁时卒于官。董宣死后,光武帝诏遣使者临视慰问:唯见布被覆尸,妻子对哭,有大麦数斛,敝车一乘。帝伤之,曰:“董宣廉洁,死乃知之!”以宣尝为二千石,赐艾绶,葬以大夫礼。

严耕望考证,董并也许随父亲董宣在北海国生活过几年,对山东半岛有着美好的记忆,极可能举家迁徙到出仕地。他在山东的生活和后代的情况史无记载,但其子孙在齐地或附近安居生息是极有可能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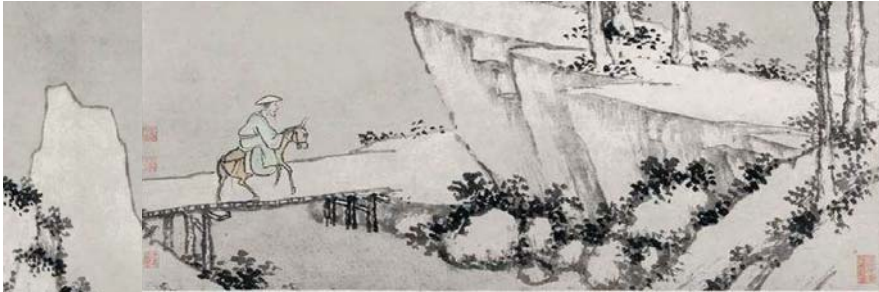
蒋英炬等认为:“孝堂山石祠的年代确定为一世纪东汉早期的章帝时期(或早至明帝)比较确切。”更准确地说,约在公元73年至83年之间。这与史书记载董并出仕齐相,和子孙定居山东的猜想,在时间上是相吻合的。此时董宣辞世已二三十年。

正如我们对朱鲋石室为何会在东缙国(今山东金乡县)一样难以理解,许多断裂的历史,还有待新的发现,提供更多新的线索。目前只能猜测,因为某个未知的机缘,董并的儿孙定居到了济北国,在新开辟的家族墓地——荒芜的巫山上营造了祠堂;另外,董宣在当时美名远播,山东父老感其恩德,有自发为他立祠的愿望,这种情况在他的恩师侯霸的身后就发生过。史载,侯霸薨,“临淮吏人共为立祠,四时祭焉”。

最迟在北齐时期,孝堂山祠主就指向了孝子郭巨,传说盛行千余年不衰。如今,祠主“郭巨说”已被研究者彻底否定。那么石祠是如何附会到郭巨身上的?

汉时倡导以孝治国,“郭巨埋儿”的孝行故事在东汉广为流布,妇孺皆知,民间对郭巨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今人。干宝《搜神记》说“郭巨,隆虑人也,一云河内温人”,虽然籍贯并不十分明确,但在东汉时,这两地同属“河内郡”,河内郡的郡治在怀县,而董宣担任过“怀令”。对于后世的乡人来说,河内郭巨比“怀令”董宣的名气要大,北齐陇东王“感孝颂”即提到“前汉逸士,河内贞人”。久而久之,当地的百姓已经把董宣祠堂讹传为郭巨祠堂了。

孝堂山石祠还有许多未解之谜,尚有多幅画像难以索解。如:为什么有三座并列的楼阁和祠主?如果一位是董宣,另外两位是谁?此类问题还期待研究者的不断深入探寻。



近日,国内现存最长木拱廊桥——福建万安桥突发大火,毁于一旦,令人不禁扼腕叹息。作为水路和陆路的重要交通方式,桥自从被创造以来,便一直发挥着此岸到彼岸、此山到他山的实际功效。而在情怀浪漫且富有创造力的古代文人眼中,桥却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——连接人心,沟通古今。在一个清风摇翠的夏日,笔者翻开尘封的书页,踏上了古人走过的桥。

■长安灞桥:灞桥烟柳知何限,谁念行人寄一枝

自古东出长安,过了灞桥便是中原的地界了。千百年来,经由此地的贩夫走卒、客路之人,戍边将士不计其数,在或太平或离乱的时代中不断奔走,他们在灞水波澜不惊中告别,在灞桥之上伫立回望。与此同时,深沉的离愁别绪也在酝酿,在发酵,最终从人类精神的高地喷薄而出,于是,一首首光耀千古的名篇诞生了。

据《三辅黄图》记载:“灞桥在长安东,跨水作桥。汉人送客至此桥,折柳赠别。”纵然洒脱如李白,在听闻洞箫呜咽之后,笔墨也不免感伤,于是写下了“年年柳色,灞陵伤别”的诗句。还有被后人称作“诗豪”的刘禹锡,在面对灞桥的时候,似乎也失了几分豁达之气,他笔端流淌的“征徒出灞浹,回首伤如何”,甚至比李白更哀婉伤情,远行之人不忍卒读,却已潸然泪下。

“杨柳含烟灞岸春,年年攀折为行人”。灞陵桥和灞桥柳,这两个意象共存共生,相依相偎,极大地丰富了国人表情达意的情感载体,折柳相送由此变成了诉说挽留之情和祝福之意最浪漫最诗意的方式。而灞桥也在文人的观照下,突破了物质与时空,最终演变成文学世界里一座生生不息的“情尽桥”和“断肠桥”。

■扬州二十四桥:天涯回首一销魂,二十四桥歌舞地

淮左名都是扬州,竹西佳处亦是扬州。孟浩然在烟花三月的灿烂时节,一边吟咏着“故人西辞黄鹤楼,烟花三月下扬州”,一边荡漾扁舟,顺长江而下。唐人张祜初到扬州,便已思量好了身后之事,竟发出了“人生只合扬州死,禅智山光好墓田”的感慨,着实让人凄惻动容。

二十四桥在扬州。关于二十四桥到底是一座桥还是二十四座桥的浪漫争论,至今未休。数不清的学者、道不尽的缘由,其实并不妨碍一代又一代的文人们在此地挥毫泼墨。在扬州众多拥趸之中,翘楚者当为唐人杜牧。杜牧家世显赫,加之少年成名,故而颇好结交游宴,时常放浪形骸。某个月明星稀的夜晚,他借着几分醉意,把心绪糅进月光,写下了“二十四桥明月夜,玉人何处教吹箫”。从此以后,二十四桥便走进了文学的地界,文人雅士纷纷留下墨宝,贺铸吟道,“二十四桥游冶处,留连”;王奕带着悔恨与不甘写下了相见恨晚的落寞——“二十四桥明月好,暮年方到扬州”。

遥想当年,白石老人姜夔途经扬州,看到曾经被杜牧深情以歌的好山水,如今却因连年战乱而萧条凋敝,不觉心生悲凉,化而为词,其中有言曰:“杜郎俊赏,算而今重到须惊。纵豆蔻词工,青楼梦好,难赋深情。二十四桥仍在,波心荡,冷月无声。念桥边红药,年年知为谁生?”

■成都万里桥:雕鞍送客双流驿,银烛看花万里桥

三国时期,诸葛亮伐别即将出使东吴的费祎,费祎感叹,“万里之行,始于此桥”,万里桥由此诞生。可以说,正是因为天府之国的富庶与周遭风物的美好,使得历代文人心向往之,故而反复吟咏玩味,作品不可尽数。

安史之乱后,诗圣杜甫拖着“百年多病”的身体,扶老携幼,一路流寓西南,至成都,便在万里桥西、浣花溪边搭建茅屋。片刻的安逸宁静,使杜甫一改“沉郁顿挫”的诗风,深情款款地写下了“万里桥西一草堂,百花潭水即沧浪”“西山白雪三城戍,南浦清江万里桥”等清新明快的诗歌。正所谓“国家不幸诗家幸”,一生漂泊、无所依的诗人,在山明水秀的锦官城得到了人生中屈指可数的安宁与慰藉。

唐王建一首《寄蜀中薛涛校书》,“万里桥边女校书,琵琶花里闭门居。扫眉才子知多少,管领春风总不如”,让薛涛名噪一时,赢得了“扫眉才子”的美誉,却未曾想到,这也给她孤独终老的后半生埋下了伏笔。深居浣花溪,手制小彩笺的薛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,终是没有等来那个对她说过“别后相思隔烟水,菖蒲花发五云高”的浪荡公子元稹。万里桥终究成了薛涛生命中的伤心地和离恨天。诚如元杂剧所言:“三十三层天,离恨天最高;四百四十病,相思病最苦。”

■南京朱雀桥:我欲去寻朱雀桥,淡烟落日风萧萧

光阴流转,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依然未改旧时波;风吹雨打,静默不语的朱雀桥早已洞悉世事沧桑。那些波诡云谲的风云,金戈铁马的岁月,以及悼感怀伤时的愁思,被定格在秦淮河和朱雀桥不悲不喜的时光里。

刘禹锡在历经人世波折、遭受政敌排挤的愤慨中,悲愤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句:“朱雀桥边野草花,乌衣巷口夕阳斜。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”,字里行间满含忧国忧民的大情怀、大格调。宋室南渡后,词人朱敦儒在登临凭吊时,但见“朱雀桥边晚市,石头城下新秋”,忽觉内心隐隐作痛,只一瞬便化为“昔人何在,悲凉故国,寂寞潮头”的感喟与哀思。“元曲四大家”之一的白朴,在金陵城下、朱雀桥边,忽然忆起六朝繁华旧梦,感叹道:“朱雀桥边野草,白鹭洲边江水,遗恨几时终”;清人纪昀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写下的“六朝燕子年年来,朱雀桥圯花不开。未须惆怅问王谢,刘郎一去何曾回?”更将那种“物是人非事事休”的落寞表达得淋漓尽致、哀婉久绝。

当然,曾经在文学的天空中别离过、悲感过的桥,远远不止于此。还有在一千多年前某个“月落乌啼霜满天”的夜晚,张继夜泊后,方才闪耀在文学国度里的枫桥。因轰轰烈烈的爱情而被人们熟知的断桥、鹊桥和蓝桥,以及晏几道笔下那座只存在于精神层面的谢桥,它们共同支撑着、扶持着,托举起了古代文学的一座又一座高峰。

就在这个烽烟散尽的夏日,我跟着古人行色匆匆的脚步,与他们一道读了桥,也读懂了桥。

古诗词里的桥，穿越千年的感慨

□牛艺璇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徐静 美编:陈明丽